

第一章

先驱者的漫漫求索

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于 1911 年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军阀官僚的封建统治，却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中国在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之后，又进入了一个空前黑暗的军阀政权时期。“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接踵而至的是更加严重的内忧外患。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愈发紧迫，国内政治风云诡谲，专制战胜自由，独裁压制民主，国家一天天败坏。孙中山痛心地说：“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

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①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当时有人把这种内忧与外患交织的困状，形容为“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 风雨四至”。亲爱的祖国母亲在遭受无情的蹂躏 她的旧伤新痕在流血，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华民族的出路何在？大多数的中国人陷于迷惘、徬徨与苦闷之中，而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在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问题，执着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狂飚突起的新文化浪潮

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曾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延续了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推翻了，“君权神授”的神话破灭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是这种兴奋的心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在随后的几年里，人们便从希望的高峰跌入失望的谷底。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有人这样写道：“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的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② 这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04~105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②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文集》三十三，第 80 页。

段话，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混乱局势的悲观和不满的心情。于是，“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这种怀疑和失望的情绪在知识界表现得最为明显，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孕育之中。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加剧了人们的怀疑和失望。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标志封建专制势力在政治上的重新抬头。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相呼应。袁世凯上台以后，帝制派的复辟活动甚嚣尘上，尊孔空气阴霾弥漫。民国元年（1912），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成立“孔教会”，倡言“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提出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在戊戌变法中曾经叱咤风云的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就成了保皇派的头子，公开反对革命，鼓吹君主立宪。清王朝的倒台令他痛心疾首，于是极力诋毁共和制。他说：“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敝，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②对孔子之教，康有为却极尽吹捧之能事，称孔教是“国粹”、“国本”、“国魂”，其博大精深，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精粗，无一而不举。“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③。他提出恢复读经，立孔教为国教，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欲不亡中国，“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④。康有为把资产阶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③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同上书，第800页。

级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把恢复传统的伦理道德当作救世灵丹，称“今欲救吾国人于洪水中，必先起其道德之心，必先生其畏敬之念，必使有所至诚至敬，然后其言可信也，其行可则也。”^① 他的这些言论，助长了政治上的倒退和专制复辟的出现。

复古派把当时政局动荡、政治腐败的原因归咎于共和制度的建立，发起了对共和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攻击。他们指责共和制度为误服了欧美已经唾弃的民权之说，是罪恶之源，应对出现的种种黑暗现象负责。共和政治实际上是“众乱政治而已矣，众恶政治而已矣”，继续下去，必将是浩劫连绵，以至亡国不止。他们对平等自由之说深恶痛绝。在他们的心目中，“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隳突桀颡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以若是之俗而为共和，则是附虎以翼，添火以油，共争共乱，岂复可言哉”^②。

康有为等人的复古论调，正合袁世凯的心意。他一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就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随后又制定了祀孔讲经的办法，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他还亲率百官到孔庙举行大型祭孔活动，行三跪九叩大礼。一时尊孔之风大盛。醉翁之意不在酒，袁世凯吹捧孔子和孔教，目的是为实现当皇帝的野心。他恶毒咒骂共和制度是内政紊乱的原因，尤其是 1913 年 9 月他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后，复辟野心更是溢于言表，甚至以皇帝自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 799 页。

② 同上书，第 884 页。

居，大嚷什么“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指手划脚地胡说中国没有立宪的资格，“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在他的支持下，筹安会之类的组织也拼命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①

面对思想文化领域里封建复古主义逆流的泛起，进步的人们不得不奋起反击。一群政治敏感、思想激进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作认真的反思。他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单单推翻一个皇帝，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成功，也无法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命运。他们憧憬和向往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断定平等的人权、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自由，才是欧美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深入的思想革命，提倡新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彻底铲除“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胡适曾痛心指出：山河遭此厄运，苟且偷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②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振奋起民族精神，让愚昧麻木的民族从昏睡中醒来，焕发出新的活力。他们满怀炽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地宣传民主与科

^① 《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17 页。

^② 同上书，第 1 卷，第 417 页。

学的新思想，向封建专制主义和腐朽落后的旧文化发起勇猛的冲击，表现了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的倡导下，一场旨在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了。

在思想界首先树起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的，是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①。《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开宗明义地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号召最少思想禁锢的青年一代推旧创新，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起来斗争。他充满激情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②他还提出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六项原则，即“六义”：1.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6年新年之际，陈独秀又提出：“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③

李大钊也大声呼唤“青春”的人生观：“进前而勿后顾，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初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从1916年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

② 《独秀文存》第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同上书，第33页。

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①，沿着“青春之大道”奋勇向前。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提出了两大口号：科学和民主，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明白昭告世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②

这些脍炙人口的文字，在长夜弥漫的中国，无异于一声惊雷，鼓舞着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人们。从此，《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火炬，勇敢地向黑暗腐朽势力进击，成为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最有力的启蒙者。

简要说来，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又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第一，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政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陈独秀提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

①《李大钊选集》第 76、71 页，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②《独秀文存》第 243 页。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民主观念，首先是个人的独立意识。陈独秀等认为，培养青年一代独立自主的人格最为重要。因此他要求青年人“当纵横一世，独立不羁”，做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凡事“求诸自心之真知灼见”，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总之，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而不可盲从先贤圣人。至于君主，陈独秀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只是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这些人比寻常人还要可怜，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没有一点神奇出众的地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当时启蒙思想家们共同的救国方案。陈独秀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② 他所说的“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即资产阶级的共和立宪制。

第二，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孔子及其学说，尤其是对儒学核心的“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批判，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狂涛巨浪。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陈腐的封建伦理，是“奴隶之道德”，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文章，指出孔子三纲说的核心是封建专制主义。“儒者三纲之说，为一

^① 《独秀文存》第 79 页。

^② 同上书，第 40 页。

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②这种东西与共和制度绝不相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孔子之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战士鲁迅，于 1918 年 4 月发表讨伐旧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对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并在小说的结尾悲愤地疾呼：“救救孩子！”李大钊直指孔子为“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而旧思想旧道德则“锢蔽其聪明，夭阏其思想，销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而吾之群遂以陵替。”^④这些言词不啻震古烁今、石破天惊

① 《独秀文存》第 34 页。

② 同上书，第 41 页。

③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25 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 44 页。

之论，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发表文章抨击孔学“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①。他们一眼看破复古派鼓吹孔学，意在恢复君主制度，痛斥孔教会一类的尊孔组织是“复辟党”。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②维护等级制度的孔教，与封建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因此，捣毁孔子的偶像，也就是掣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第三，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宗教迷信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要解放思想，冲决罗网，必须彻底破除封建迷信，提倡科学。科学既是指自然科学知识，更是指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科学与民主是互相联系着的，“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坚信，相信科学才能相信理性，尊重科学才能尊重理性。“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③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就是陈独秀等人追求的科学精神。

为此，《新青年》与灵学派进行了一场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激烈论战。为了揭露灵学派的欺骗宣传，陈独秀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遵循着一定的因果法则，他在题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第36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李大钊选集》第244页。

《独秀文存》第8、9页。

为《偶像破坏论》的文章中指出，天地间根本不存在什么鬼神，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他以辛辣俏皮的口吻讥讽宗教偶像是“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①，十足一个十不全的怪物。他还提出要用科学代替宗教。这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蒙昧、提倡科学和无神论的战斗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发表了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宣扬科学知识，宣传唯物主义。

第四，反对旧文学，主张新文学。《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号召文学革命。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里主要还是讲的文体的改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较胡适的态度更为坚定，更为激进。他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纲领。胡适、陈独秀的主张得到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热烈响

①《独秀文存》第156、154页。

应，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鲁迅用白话文写的《狂人日记》，就是新文学的典范，它的问世开辟了文学革命的新纪元。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引起了守旧派文人的阵阵惶恐。1918年夏，守旧派文人辜鸿铭写了《春秋大义》一文，公开鼓吹尊王、尊孔，宣传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思想保守的《东方杂志》立即响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辜的观点。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等文，犀利地批判了《东方杂志》维护名教纲常等旧伦理、旧道德，反对西方文化的立场，揭露了他们鼓吹的“新旧思想融合论”是借用共和之躯壳，保护孔教之灵魂。翻译家兼桐城派文人林纾于1919年2月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影射攻击。他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信，攻击新文化运动“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他认为，由于新文化运动，造成“人心丧蔽，已在不可挽救之时”，要求蔡元培“据中而立”，以“守常为是”。奉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立即回信作答，反驳了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诬蔑，表明了坚持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的决心。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舆论亦与守旧派展开激烈的争论。李大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守旧派反对新思潮的鬼蜮伎俩。他指出，守旧派反对新文化运动，是“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这帮人“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

对立的存立”^①，戳穿了守旧派企图借军阀政治的威权镇压新思潮的阴谋。李大钊以非凡的气概申明，任何强权和暴力“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②理屈词穷的林纾等人不堪一击，不久便偃旗息鼓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从性质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然而，它的意义仍是巨大的。《新青年》犹如一柄锋利的剑，一把冲天的火，刺破封建网罗，照亮黑暗夜空。它发展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风气，触动了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基础，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复古逆流。它在反封建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也因此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

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③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要倡导者工作的北京大学，成为民主思想的发祥地，受到他们影响的青年

《李大钊选集》第 156 页。

同上书，第 217、21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0 页。

学生，成为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二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民主、科学的新思潮，使人们从封建专制思想、旧伦理思想、迷信愚昧等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增强了探索真理、要求革新、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民主、科学的新思潮就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新文化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局限性。当时站在斗争前沿的，还是一些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派，他们的旗帜，他们用来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也就不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看法都有偏激之处。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不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早就作了公允的评价。

二、东方地平线上的一缕朝霞

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到社会主义，始自于 19 世纪末。辛亥革命前，人们已在谈论社会主义，甚至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开始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是在 1899 年；开始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在 1903 年。但是那时人们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它看成是众多社会主义学派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是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两个大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李大钊则是在中国系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爆发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最早取得的成功，社会主义已经从思想体系、革命实践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制度。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与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重新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的强盗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使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莫大的欣慰。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一些既担忧祖国命运又密切关注着世界变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是站在它的对立面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如鲁迅就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到了“一种薄明的天色”，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①。他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②他们通过十月革命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用以指导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后来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356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五四爱国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19年1月，在英、美、法、意、日五国操纵下召开巴黎和会。它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取消外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租界和势力范围等正当要求被拒绝，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外交失败的消息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爱国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随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集会上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悲愤地呼唤全国同胞：“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北京学生的行动震动了全国，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和声援，各地舆论也纷纷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严厉镇压，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运动。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也陆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湖南的毛泽东、天津的周恩来、武汉的恽代英等就是他们的突出代表。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回国

后，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迅速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兴奋地将十月革命称之为人类社会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黑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①他在1918年先后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他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②在他看来，俄国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对这一时代前进的潮流，只能迎，不能拒。他由衷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活动。他在1919年5月主编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李大钊指出，马

① 《李大钊选集》第124页。

② 同上书，第101、104页。

③ 同上书，第117页。